

挑花边

记得那时候,萧山沙地一带的农村里,一年到头喜庆事、热闹事很少,让人高兴不起来。而萧山挖掘传统工艺,组织发动沙地妇女们挑花边,开辟一条增加收入缓解农户生活困难的好渠道,深受农户欢迎,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。



文/徐焕凤 制图/俞钦洋

有资格“接花”的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。她从大队领回一大堆花边图纸和绣线,有挑花人员的家庭都会派出代表到妇女队长家里集合,接受绣挑花边的任务。似乎早已达成共识,分配花边任务不是以户为单位,而是以会挑花边的人数来确定。领回来的花边要在规定时间内绣挑好,超过期限会受到惩罚。多领任务而完不成,就不合算。当然,少领也就意味着少挣钱。因此,分配花边是件难事,要做到绝大多数妇女满意才安耽,有几户人家有意见就扫兴。

每户数量确定后,还要分图纸和绣线,有时要把印在大张上的图纸裁剪开来,把绣线按用线多少分配均匀。俗话说,四个妇女顶群鸭。三四十个女社员在一起,那个叽叽喳喳的场面,让人侧目。

记忆中,每户人家都有人会“挑花”。各家领回花边任务后,家里的女社员们就忙开了。生产队的工分还是要去挣的,不能因为挑花就不参加生产队劳动了,那就利用晚上时间挑。那时,各家各户都装上了电灯,但舍不得用大瓦灯泡,15瓦的白炽灯高高悬起,邀上邻家的女人借着昏暗的灯光,一边挑花一边聊天,倒也并不会寂寞不觉劳累。最好是天下午,队里不出工,妇女们可以安心在家挑花,也不用担心“回花”期限太紧了。

最壮观的是生产队里开社员大会,简直成了挑花比武现场。男人们聚在角落落落抽烟聊天,自觉地把光线好、淋不到雨的位置让给挑花的妇女们。挑花技能高的妇女们似乎有意表演自己的本领,飞针走线速度快,绣出的花纹质量好,很

让人羡慕;那些刚刚学会挑花或者还不会独立完成一张图案的年轻女社员,则特意坐到高手身边,以便及时请教。至于生产队长在上面讲些什么,批评了谁家、表扬了哪个好社员,大家似乎都不关心。

夏天的中午,骄阳灼人,挑花的女人们不能休息,他们三三两两地到竹园里挑花,风吹竹叶沙沙响,与挑花女穿针引线的噼噼声、开怀的说笑声组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,煞是动听。

“回花”时间到了,妇女队长又忙开了。她在家接收各家各户的花边成品,并用小布条写上户名以备查。全部收齐后,妇女队长当即送给大队专门管理的干部。大队收齐各个小队的成品,再送到公社设

在集镇上的花边站。花边站工作人员验收后全部合格,那是皆大欢喜的事。但总有几件成品被检出不合格退回,主要原因是花样变形、绣线紧松不匀、针法走形严重和成品污渍明显等。这也难怪,挑花的人水平差异大、地头干农活家务又缠身,没有时间钻研技艺,挑花环境简陋、卫生条件限制等等都影响了花边成品质量。一旦成品被检出不合格退回,不仅早起晚睡十几天辛苦白费,还要被扣除绣线和图纸的成本,真是灾难。因此,在等待结果的几天里,花边女们都担心,万一被退回,损失多大啊。

公社花边站也知道农民日子艰苦,指望挑花边的钱买盐、酱油和火柴,结算工钱倒是及时的。大队

队专管人员也不敢拖延,很快把挑花款送到各个小队。在妇女队长家里,“发钱”的热闹和喜庆绝对不亚于农户办喜事,挑花女们互相交流着喜悦,又专门叮嘱对方,不要把钱款数量如实告诉父亲或者丈夫,要是被问起,也要少说几块——留点私房钱很需要啊。领完钱,大家又打听起下一期花边任务什么时候发下来的事,妇女队长根据经验总是乐观作答:快的快的,过几天就来。果真,两三天后,新一期花边任务真的如期下达,妇女们又投入到繁忙的挑花生活之中。

今天的沙地农村早已建起第四代住房,家家户户生活富足。我想,天上不会掉馅饼,花边女告诉大家,勤劳是致富的本源。

人生不是精准轨道

文 张庆成

我曾经问身边熬熬夜的人:“明明今晚可以早点睡,第二天明明要早起,可为什么却宁愿刷手机熬到凌晨?”朋友的解释不约而同:“因为白天工作的时间并不属于自己,只有在晚上没人打扰的这段时光里,才能收获短暂的安宁。”

白天为什么不属于自己?有人说,他们渴望从工作里寻求自我认同,希望工作给予一种强烈的价值回馈。所以白天,更像在为他人而活。

他们甚至会过度放大一些想法:做一个完人,不允许犯错,不要有情绪,满足他人的期待与要求,获得众人的肯定,钵满盆满的成就……从而忽视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想要什么,在所谓的压力与责任中,产生了不必要的亢奋和忧伤。

那么,生活的意义仅仅是外在的体面吗?

“我步入丛林,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。我希望活得深刻,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。然后从中学习,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,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。”这是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所写的话。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正远离喧闹的城市,隐居于瓦尔登湖畔。他只带着一把斧头,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木屋,不去想热闹与金钱,选择融入自然以求宁静。他试图探索人性及生命的意义。尽管清贫,梭罗自身仍是自我价值的认定者,不需要外界打分。而人生连标准答案都不曾有,何来分数?所谓答案,也只是接受当下的一切,管他高山低谷。

何况,所谓低谷,谁知不是高山明月呢?

我又想起了明朝张岱。第一次了解他还是初中时学的那篇《湖心亭看雪》。他在游西湖时写下:“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,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,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少时只觉湖景映入眼帘,再读却感其一生所好。

张岱一生极为传奇,生于绍兴官宦世家,从小便豪放不羁,兴趣广泛。他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对自己的描述是:“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。”

可劳碌半生,终成梦幻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明朝国祚行将就木。甲申之变后的张岱一贫如洗。他曾想过参军抗敌,却终是书生意气,颠沛流离后归隐山林。从昔日挥金如土,到后来家徒四壁,张岱并没为此喟叹命运不公。有谁可安享百年不变之势,得唾手之局?

他接受王朝更替,找寻自我价值。他编撰的《石匮书》成为当今明史探究的基础读物。张岱用一生去阐释自我价值可以不受外界干扰,可以不为一时困窘而颓废低沉,即便沧海桑田,仍不忘生活本身。

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各不相同,无高下之分,也非他人评价之资。庄子说:“且夫水之积也不厚,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”用好每一个白天,去充实自我,武装个人能力,这比追求外在的体面会潇洒得多。

老汪说宋瓷

时间可以擦掉很多痕迹,但有些痕迹也让时间为难。

跟夏木军第一次打交道,就让我丢尽了脸面。个中的原因,到今天落笔时也没有弄清楚,此前也没有再提起过。

那是多年前在杭州二大瓷片早市上,夏木军拎着一袋瓷片找到我,想打包卖给我。我说,今天不准备多买,想逛完早市后再到省博孤山馆区看个越窑青瓷展,拎个大袋子来回不方便。

他说,展览下周也可以看,早市就这么半天。他缠着我让我买下。我问,这包想卖多少钱?他说,五百。这倒是个诚心卖的价。只是,我一旦安排好的事不喜欢改变。可又不想伤他面子,就想多多少少从他袋子里买几片也好。

当时,我在做一个吉州窑瓷片系列收藏,就问木军,里面有没有吉州窑的?他说,有,都是釉水好,釉光亮的片。

果真,打开包后,我和木军一起从里面挑出了十几块吉州窑瓷片,有凤求凰、月映梅、玳瑁斑等图案,釉水也是经典的水坑特征。木军先粗略地估了个价,要七百多元。这下,我哭笑不得。我说,这袋瓷片打包卖五百元,从里面捡出的十几片,反而要七百多元,这说不过去吧?

木军却显得很有理。他说,刚才好话给你说那么多,让你打包买,你偏不

买。现在好了,你也看到了,光吉州窑就有这么多好瓷片。要不这样吧,你给五百,把吉州窑瓷片拿走。

我也是个犟脾气,通融性差一点,再说,我们把袋子打开时,旁边也围了好几个人。我不情愿地付给木军五百,把吉州窑瓷片一一装进背包。木军也把别的瓷片装进袋里。

我朝前走了七八步,只听得身后“嘭”的一声响,像是有人跳水动作不规范而砸在水里的声音。早市上的不少人都朝这个地方看,可是古新河里除了那一圈圈泛起的涟漪,什么也没有浮出来。

我本是个围观者,殊不知自己却是那个当事人。

听周围的人在议论,在我刚转身走后,木军拎起那袋瓷片,双手用力在空中荡了三四下,然后,朝河中心扔去。

在议论的漩涡中,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逛早市,偶尔也会蹲下来,买心仪的瓷片。可始终在想,木军为什么要把那袋辛辛苦苦捡来的瓷片扔到河里?我也没做错什么,为何惹他生这么大的气?后来,我仍旧去省博看了越窑青瓷展,可心里想得更多的是,我为什么让初次打交道的木军那么讨厌?

下一个早市,我照常早起,可一直在犹豫,去还是不去?最终,犹豫再三,还是没有勇气去。

古新河泛起的涟漪

文/图 汪少一

第三个早市,我实在忍不住了,觉得坚持了好几年的南宋瓷片收集与整理,不能这样半途而废。于是,又早早地坐上了327路公交车。

到了早市,木军迎上来跟我打了招呼,看似碰上却像有几分刻意地在等我。这一个主动招呼一扫我心中闷了半月的不愉快。木军跟我说,你先去逛一圈,走时我给你看一块好片。我答应了,心里也盘算好了,既然木军先低头了,那就不管他拿的是一块啥瓷片,我都会买下来。

早市一圈转下来,我收获不少。本可以把口袋里的钱用尽,但刻意留下一半。临回家前,木军在早市南边等着我。他说,上周就在等我,没有等到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修内司官窑香炉脚,递给我,说,我知道你喜欢。

不要说我拿到手,就是他口袋里拿出这块瓷片的那一瞬间,看到那淡淡的天青色、糯乎乎的酥油光泽就喜欢上了。我接下后,问他准备出价多少。他说,八百,你能接受不?我说,你以兄弟价给我,谢谢你了。

后来,每个早市我都会光顾木军的摊位。在他那里,总能买到三五片喜欢的东西。从他手里买到的南宋龙泉香炉脚恐怕就有近两百只。也难怪,你看,木军个子不高却敦实,是挖矿矿或

煤矿特别合适的身材。

几年后的一个春节前夕,木军早市上跟我交代,中午到他租住的屋里吃饭,说是老婆从老家过来,带来了几截熏肠要送我,我一口答应了。

临近中午,等早市散后,我背着包坐在木军的电瓶车上,木军骑着车从武林广场沿着南宋御街一路向南,然后在馒头山社区的小巷里七绕八绕,来到一个老日的住宅楼前,我们一起上了二楼。

一个衣着得体、头发收拾得挺利落的小嫂子模样的人,从厨房里出来迎接我们,给我们倒茶,拿核桃吃。小嫂子问我吃不吃辣椒,我说,衢州菜、上饶菜我都喜欢吃,不怕辣。

吃饭前,木军从里屋喊出两个小姑娘,初中生模样,皮肤白,头发黑又厚,眼睛干净明亮,她俩在城市里、乡村里都算得上漂亮姑娘。

木军说,这是他家的两个女儿,都在老家上学,放寒假来杭州玩段时间。我开玩笑地说,是亲生的,不是坑蒙拐骗的吧?木军笑了,他说,你看看她俩的眼睛,哪一点不像我?我再仔细地看看木军,他的眼睛当小伙子时应该也是挺亮的,只是岁月浑浊了眼白,生活的磨砺,堆厚了眼皮。

三四年前,当捡瓷片的大潮慢慢退去,木军也回到了老家上饶。从朋友圈

中看到,他家在集镇上盖起了两开间三层的楼房。后来,又看到下面的两间开了个便民超市。夏天,门口卖些西瓜,冬天,门口在卖甘蔗。都是一看就想吃的那种。

我夸木军,房子盖这么宽敞。木军说,不算宽,将来大姑娘分一半,小姑娘分一半就没有了。我问,那你和妻子怎么住?他说,哪个姑娘不在身边,他们就住她家里,给她看门。

我说,早就听人说你的两个姑娘都有出息!语音电话里听到他先是含蓄后又克制不住的笑声,可以想象他得意洋洋的样子。我忍不住伸出脚,踢了踢凳子腿。



南宋官窑底足,早年建兰中学工地所出。